

春秋经纬书系

# 毁灭的种子

江沛 纪亚光 著

国民政府时期意识管制分析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春秋经纬书系

# 毁灭的种子

——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

江 沛 纪亚光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春秋经纬书系

毁灭的种子

——国民政府时期意识形态管理研究

江 沛 纪亚光 著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40 千字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 - 5419 - 7773 - X/G·6710

定 价:10.1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发行部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天坛路 10 号 邮编:710061 电话:5247334

## 编者的话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泱泱大国。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经历了无数的灾难和摧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当时光的洪流冲刷至今日之时，我们回首往昔，看到的是一幅幅不仅色彩斑驳，且内容极其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作为炎黄子孙，我们既为曾经有过的诸多辉煌而骄傲，也为曾经发生的无数灾难而叹息，更深感有责任对前人的历史进行挖掘和整理。将那些尘封已久而又极具价值的历史画卷清理出来，将不仅有助于增加人们对祖国历史的了解，而且对吸取前车之鉴，解决现实问题，振奋民族精神，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由各方面专家学者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推出了《春秋经纬书系》。

本书系是一套涵盖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系列丛书，选题范围广泛，涉及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以及传统习俗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在本着求实严谨的原则和前提下，作者都力图打破以往学术著作僵化刻板的模式，尽可能地以生动的语言、活泼的形式写作，使每本书融学术性、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以增强可读性。

《春秋经纬书系》第一辑出版六本，以后还将陆续推出更多的力作。

希冀通过编著者的不懈努力，将《春秋经纬书系》编成一套风格鲜明、雅俗共赏的精良之作。

编者

1999年7月20日

# 目 录

一、“一个主义” .....	[ 1 ]
1. 一元化 .....	[ 1 ]
2. 官方化 .....	[ 5 ]
3. 道统化 .....	[ 9 ]
二、“一个政党” .....	[ 15 ]
1. 一党制 .....	[ 15 ]
2. 派系纷争 .....	[ 28 ]
3. 一党专政 .....	[ 39 ]
三、“一个领袖” .....	[ 52 ]
1. 圣贤化 .....	[ 52 ]
2. 个人独裁 .....	[ 61 ]
四、法律党释 .....	[ 73 ]
1. 立法原则 .....	[ 73 ]
2. 法律制定 .....	[ 76 ]
3. 法律本质 .....	[ 78 ]
4. 体系特点 .....	[ 83 ]
五、文化弹压 .....	[ 86 ]
1. 社团管制 .....	[ 86 ]

2. 学术限定 .....	[102]
<b>六、伦理误导</b> .....	[115]
1. 忠孝为本 .....	[115]
2. 新生活运动 .....	[126]
<b>七、教育“党化”</b> .....	[140]
1. 党义教育 .....	[140]
2. 训育制 .....	[145]
3. 特种教育 .....	[155]
<b>八、舆论箝制</b> .....	[160]
1. “党化”方针 .....	[160]
2. 新闻审查 .....	[163]
3. 审查、追惩 .....	[166]
4. 特务行径 .....	[175]
<b>九、摧残文艺</b> .....	[183]
1. “文以载道” .....	[183]
2. 文艺禁锢 .....	[186]
3. 艺术摧残 .....	[190]
<b>十、结 语</b> .....	[194]
<b>后 记</b> .....	[196]

## 一、“一个主义”

寻求思想禁锢，倡导思想一元，是一切专制政治的必然取向，也是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及其政府在意识形态管理上始终如一的指导精神。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对于平定宇内的君王，总有一个“内圣外王”的要求，不但要成为政治上的绝对权威，而且还要成为思想、精神上的绝对权威，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服众。为了实现传统政治文化的潜在要求，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在占据国家政权后，不自觉地开始塑造起自身的思想权威形象。这种思维方式，在民国时期的政坛上表现得相当强烈，它大大影响着民国时期政治家的行为方式。其表现就是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尤其是思想上进行一元化、官方化和道统化的宣传。

### 1. 一元化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国民党就公开宣称：“惟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途径。”强调思想意识的统一对于中国走出贫穷积弱状况的必要性，并声言：“凡反对三民主义者即反革命。”<sup>①</sup>

---

<sup>①</sup>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身为国民党首脑的蒋介石，更是极力宣扬专制集权的政治意识。循着传统的政治思维，蒋介石把民国以来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混乱状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中共军队的红色割据，乃至各省地方势力自治、甚至联手抗衡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统一中国的行动，都归为是由于“思想的纷杂”方导致中国民众无所适从，无法确定究竟哪一种体制最适合中国国情，也不能认清国民党才是中国的唯一救星。据此，蒋氏认为统一全国的思想是当务之急。他提出：“拿三民主义来做中心思想，才能统一中国，建设中国；如果中国各派的思想不能统一，中国的建设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思想之统一，比什么事情都要紧。”“要确定总理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sup>①</sup> 国民党也把三民主义作为衡量一切思想意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甚至以“违反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反动与腐朽思想标准。”<sup>②</sup> 在蒋介石看来，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应该是“以军队的组织、军队的纪律、军队的精神和军队的行动与生活，使之普及于政治、经济、教育，以至于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战斗体，最后要做到民众即军队，军队即民众，生活即战斗，战斗即生活。”<sup>③</sup> 一元化的思想特征再也明显不过了。

作为这种思想意识的具体表现，1928年10月由国民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训政纲领》中规定：在必要时，国民党可对民众的言论、出版等自由权，“在法律范围内加以限制”，公然

---

① 蒋介石：《中国建设之途径》，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57页。

② 国民党训练部档案，(9)884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③ 蒋介石：《剿匪成败与国家存亡》(1933年10月)，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第1卷，台北中华大典编印会1974年版，第226页。



将一党主义的思想禁锢强加于亿万民众。1937年，国民政府制定的《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明确指出：思想必须一元化，所有民众读物，“应把握三民主义为唯一出发点，不许有其他思想存在其间”<sup>①</sup>。这种“思想统治”的意识，构成了国民政府时期思想箝制的根本精神。

抗战爆发后，在全国各界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曾对舆论控制有所松动。然而，这显然是权宜之计。1938年以后，在“战时需要”、“齐一思想”的借口下，国民党又重新强调了对于舆论箝制的指导思想。他们认为，抗战以来，“各方之宣传刊物如雨后春笋，盛极一时，其中认识正确、动机纯洁者固多，而言论幼稚，主张怪诞者，亦不为少。若而刊物，率多在我对日抗战一词掩护之下，或则抨击政府、妄作主张，或则厚诬本党以十年来均未一行主义；光怪陆离，不一而足”。“横流所及，遂使民众有无所适从之感，敌人得施其挑拨离间之谋，既以破坏民族之阵线，复以影响抗战之前途。而此种幼稚危险之宣传，倘令蔓延，不加纠正，尤足使一般青年政治斗争之意识超于民族斗争的意识之上，是其为害，宁不甚烈”。再一次呼吁，“行动应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sup>②</sup>。其后，在1939年3月12日公布的《国民精神动员总纲领》中，国民党老调重谈，认为“抗战以来，全国之思想与言论，在根本上虽已形成统一，而枝叶上纷歧，仍所在多有，若任其杂然并存，势必导民

---

① 《民众读物改进方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56页。

② 《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案》（1938年3月31日），浙江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第2册，第349-350页。

志于纷歧，贻战事以不利”，并将“纷歧错杂之思想必须纠正”列为对国民“精神之改造”的重要方面。

为此，国民党中央机关刊物曾发表文章大造舆论，极力贬低民众争民主运动的价值。他们认为：“民主是必须争的？拿到民主，一定能打退敌人呢？还是只求打退敌人，不必问民主不民主？恐怕是测验的结果，仍然是胜利第一，民主第二。”因此，“当前只能有养成人民政治能力的民意机关，而不能突然成立完全民权的民主制度。抗战保证将来的民主，而当前空喊的民主，决不是保证抗战胜利的唯一条件。”<sup>①</sup>“要想集团的运用精神发展精神的无限能力，就要把自己运用精神的权利交给最高领袖，也就是尽真自己的能力去接受最高领袖精神支配。这样就可以把自己的精神和最高领袖的精神合为一体”。“把我们的精神寄托在民族国家上，就是寄托在三民主义的信仰和总裁的服从上”<sup>②</sup>。1940年3月23日，蒋介石在为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第一期毕业生讲演时提出，新闻界必须“善尽宣扬国策之一责任。一切言论记载，悉以促进我国民独立自主心，养成我国民奋斗向上心为旨归，处处遵守抗战建国纲领，时时不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sup>③</sup>。显然，强求言论一律的精神是不言自明的。

1943年3月，在蒋介石授意下，由蒋介石署名、陶希圣

---

<sup>①</sup> 《民意机关与民主政治》，《中央周刊》第1卷第4期（1938年7月28日）。

<sup>②</sup> 余卓坚：《国民应以至诚接受精神总动员纲领》，《中央周刊》第1卷第31期（1939年3月9日）。

<sup>③</sup> 《尾勉新闻界战士》（1940年3月23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1页。

代笔的《中国之命运》出版，从理论上完备了国民党专制政治的思想体系。蒋介石在书中公开反对民主政治和思想自由，他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越出了“法定的界限”。所以，“中华民族要结成坚固石头一样的国防的组织体，则个人不能享有象一片散沙一样的‘自由’，是不待言的”。因此，他提出的“建国方略”的最主要工作首先是搞好“心理建设”，民众“只须遵循主义，按着方略，顺着成功的路线，穷理致知，实践力行”，“自必能达到最后的成功”。目的是要使民众在心理的潜意识上完全接受政治专制，容纳思想统制。

由此可见，强调思想禁锢，是国民党及其政府实行专制政治的必然要求，思想禁锢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实行言论一律的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在言论一律的精神指导下，国民党及其政府为国统区的思想宣传涂上了一层浓重的“党化”色彩。

## 2. 官 方 化

在思想宣传方面确定三民主义一元化之后，国民党便借用其所控制全国的主要新闻媒介，大力推行思想意识的官方化。

国民党人认为：若能全国一致信奉三民主义，“彻底指导其政治的、社会的一切施設，则此民族即可发扬无量之活力”<sup>①</sup>。国

---

<sup>①</sup>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1928年2月7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17页。

国民党每一次的中央全会，几乎毫不例外要通过一个《统一革命理论案》之类的议案，反复强调在全国及国民党内树立三民主义的理论权威地位。在国民党看来，其内部的“纠纷百出”，不是源于其政治体制与组织机制的弊端，而是由于“理论中心不能建立。共信不立，互信不生，则宣传不能统一，行动不能一致，力量不能集中”<sup>①</sup>。

针对这种状况，国民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出版有关三民主义的宣传书籍，要求每个出版社、杂志社都出版此类书籍。1938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宣布：凡是翻印《三民主义》、《实业计划》、《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建国大纲》等著作合订本5000册以上者，奖励1000元；翻印4000册以上者，奖励750-1000元；翻印各种单行本印数与上述合订本印数相同者，给予相当于15%-30%的合订本奖金<sup>②</sup>。1939年，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132次会议通过的《党义著述奖励办法》规定：凡“于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史实，有特殊之贡献者，能将党义描写为优良之文艺作品者，对于本党主义、政纲、政策，为系统之解释者”，给予奖励，或通令全国各级学校作参考书，给予200元至2000元的奖金<sup>③</sup>。在大学内开设“党义”课程，讲授三民主义、国民党党纲、政策，把此课程

---

<sup>①</sup> 《统一革命理论案》（1928年8月11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35页。

<sup>②</sup> 《中央宣传部奖励翻印总理遗教办法》，《中央周刊》第1卷第19期。

<sup>③</sup> 高廷梓：《过去党义教育的检讨与今后党德的实行》，《中央周刊》第1卷第21期（1939年1月1日）。

列为必修课程，没有这门课程成绩的学生不能毕业。在中学内，也试行进行“党义”教育。这些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在青年一代中造成一种意识形态官方化的思维模式，使人们自觉地从官方立场思考问题。

在推广三民主义、使之成为官方学说和社会主流理论的努力上，蒋介石不遗余力，到处讲演。

从北伐时期开始，蒋介石就在各种场合大讲三民主义，以表明自己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概要》（1924年10月10日）、《三民主义要旨与三民主义教育之重要》（1927年1月）等，都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宣扬三民主义的演讲。他甚至在演讲中提出，“历史文化之传统的根本精神，就是国家的灵魂。这个灵魂的强弱兴替，就直接影响于一个国家的盛衰”。而现今“中国的灵魂，就是总理的三民主义”<sup>①</sup>。

在大力推广三民主义的同时，国民党却将共产党及共产主义视为中国近代化的大敌，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1928年2月2日至7日，国民党第二届四次中央全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开幕词中明言：“总理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于今一点也没做到”，根本原因是由于“共产党妨害我们的革命及本党的主义”。所以，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共同一致反对共产党。我们不仅反对他的主义，而且要反对他的理论与方法”<sup>②</sup>。“自此以后，不特从组织与理论上绝对肃清共产党

---

① 《中国魂》（1934年7月16日），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版，第854页。

② 《开会词》（1928年2月2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07页。

与共产主义，尤必须从组织与理论上建设真正的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sup>①</sup>。

国民党及南京国民政府显然对三民主义的理论威力自信不足，因此不仅极力反对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也反对其它任何一种思想意识的过分传播，以免影响三民主义思想意识的官方化地位。1930年6月下旬，国民党中宣部曾饬令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以不少教会学校“常在校内陈列宗教书报及图画，向学生宣传诵读，实属有违规定”为由，要求“一体严禁”<sup>②</sup>。

显然，国民党推行思想宣传的官方化，是为了从思想意识的角度扩大其统治的民众基础，以巩固其集权体制存在。国民党意识到，传统的中国人习惯于一元化的思想模式，习惯于中国社会在思想、意识、道德、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有一个统一的存在，似乎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必然会搞乱人们的思想，进而引起政治纷争和社会动荡。民国之后，东西方文化观念在知识分子群体中曾引发了不少震动，许多人常把民主与自由的名词放在嘴边，但这种震动究竟在多大层面上引发的人们的意识觉醒，是一个至今无法确定的问题。更何况在市民阶层和农民阶层中，这种新鲜的思想得到了多少人的认同，也是一个问题。民初共和体制的确立到袁世凯对议会的践踏，在更多人的意识层面引发的是西方政治体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感受，这一点在蒋介石等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言论中反映极多。因此，国民党强

---

<sup>①</sup> 《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宣言》（1928年2月7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516页。

<sup>②</sup> 《中宣部严禁学校宗教宣传》，《中央周报》第108期。

调思想的官方化，既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当时中国人的政治心态，也符合其“一党治国”的集权需要。所以，南京国民政府确立后的十年间，国民党及其政权的统治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甚至地方军阀的认同，其思想官方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只是国民党并没有极好地利用这一心理认同。随着其体制内部的腐败日益严重，这种心理认同也就烟消云散了。

### 3. 道 统 化

余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孙中山这段在民国时代为人们耳熟能详的遗嘱，语气铿锵，意味深长，每每读起，令人血脉喷张，曾鼓励着大革命时期的万千民众为实现国民革命的理想而奋斗。1925年5月，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宣称：“吾党同志惟有全体一致奉行总理之遗教，不得有所特创。盖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惟有完全继承中华民国制

造者本党总理孙先生之意旨，为能实现耳。”<sup>①</sup>至此，三民主义的权威性和崇高地位被正式确立。

作为中华民国的国父，孙中山在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反对袁世凯独裁和军阀乱政的运动中，都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在国民心目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其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也在革命的浪潮中成为一面夺目的旗帜。在当时的中国，谁都知道，孙中山这个响亮的名字，就是革命、正义、平等、民主、民生、民族的代名词，其学生、传人也就是中国第一大党——国民党的当然领袖。因此，无论是国民党中的哪一派别，都极力标榜自己是主张三民主义或认同于三民主义的，蒋介石、胡汉民、邹鲁、谢持、邓演达、冯玉祥乃至后来成为头号汉奸的汪精卫，都无不将自己打扮成三民主义的信徒，目的也就是在于获得思想道统上的正宗地位和民众的信赖。就连中共也在思想信仰上宣称，其主张的社会主义思想与三民主义在救中国的道路上是殊途同归的。

从国民党史上看，国民党内的元老居正、邹鲁、谢持乃至胡汉民、汪精卫，都比蒋介石的地位高，都比蒋介石更有资格称自己是孙中山的思想传人或学生，这就给仅靠北伐起家的武将蒋介石提出了一个难题：如何树立蒋介石是三民主义创始人孙中山真正传人的地位？

为了树立蒋介石是孙中山最倚重的学生、思想传人的地位，蒋介石借助于国家宣传机器，在各种场合鼓吹自己是孙中山晚年最亲近的人。蒋介石在娶宋美龄为妻的行为中，显然也

---

<sup>①</sup>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以资料》上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81页。



考虑到了宋氏家族与孙中山的裙带关系。正如后人分析的那样：“蒋渴望独自继承孙逸仙的遗产。”“不能看轻孙逸仙的形象的重要性。他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半神化的人物。……政治家或将军只要同孙有一丝关系，也就带上了某种神奇的色彩。”<sup>①</sup>

为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是真正的三民主义，借高举孙中山的大旗收拾人心，蒋介石及其幕僚一方面宣称自己才是三民主义的正宗传人，同时，蒋介石还在各种场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去阐释三民主义，以使三民主义更加符合中国人的心态。

针对一些人提出孙中山三民主义是借鉴西方政治思想产物的观点，蒋介石的理论快笔戴季陶相继推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重头文章。在戴氏看来，孙中山建立的是“以中国之历史的哲学思想为基础，以适合中国民族之迫切的需要为方法，以世界民生问题为解决对象，以世界人类的大同进化为终结目的之三民主义”<sup>②</sup>。他认为，“中山先生的主义最崇高的一点是在他说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道德精神是民族自信力的基础”<sup>③</sup>，“民族主义的基础，就是在孝慈的道德，民权主义的基础，就是在信义的道

---

① [美] 斯特林·西格雷夫：《宋家王朝》，澳门星光书店 1985 年 10 月版，第 243 - 244 页。

② 《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1983 年编印，第 63 页。

③ 《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1983 年编印，第 14 页。